

秦城《红罗记》传奇稿本的发现^{*}

孙 书 磊

庄一拂《古典戏曲存目汇考》、周妙中《江南访曲录要》、李修生《古本戏曲剧目提要》等皆将秦子陵《如意珠》传奇著录为明末清初作品,认为清代叶怀庭《纳书楹曲谱》所收、姚燮《今乐考证》所著录的无名氏《如意珠》传奇即秦子陵的《如意珠》传奇。笔者曾揭示过南京图书馆(以下简称“南图”)古籍部典藏稿本《如意珠》传奇,通过对稿本《如意珠》传奇的考证,我们发现,秦子陵不是明末清初人,而是清后期人,生年在清嘉庆九年(1804)之后,清同治八年(1869)暮春尚在世;秦子陵《如意珠》作于清同治六年之前;《如意珠》有两种,《纳书楹曲谱补遗》所收、《今乐考证》著录的《如意珠》并非秦子陵《如意珠》,而是出现在清乾隆五十九年(1794)之前内容与秦子陵《如意珠》传奇完全不同的无名氏同名作^①。

笔者在南图又意外地看到秦子陵的另一剧作:《红罗记》传奇的稿本,《红罗记》传奇稿本的发现不仅印证了笔者此前关于秦子陵及其《如意珠》传奇考辨的结论,而且还为我们进一步了解秦子陵提供了更多的信息。

^{*} 本文是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五”规划基金项目“南京图书馆典藏孤本戏曲研究”(项目编号:04ZWB019)之一部分。

—

迄今为止,古代以及近现代的任何戏曲研究文献都未著录秦子陵的《红罗记》传奇,南图典藏稿本《红罗记》传奇为我们提供了该剧的第一手资料。

南图稿本《红罗记》传奇,全书四册四卷,每册一卷。四册分别题署“红罗记传奇卷一,如皋莲乡秦子陵填词”,“红罗记传奇卷二,如皋小雅秦子陵填词”,“红罗记传奇卷三,如皋小雅秦子陵填词”,“红罗记卷四,如皋小雅秦子陵填词”。

第一册扉页从上方到右面再到下方,有墨笔所画弧形芭蕉树一株,芭蕉树叶下墨笔竖书篆体“驻春楼”三字,其右下侧自上而下分别钤有阴文方朱印“秦城”和阳文方朱印“子陵”,左上侧钤有叶形阴文朱印“卧云”。

扉页之后,分别署“时在道光甲午岁嘉平月竹醉日灿亭管华书于兆花书屋之南轩”、“时在道光乙未岁正阳月之中浣云渚李光玠拜撰”、“同治甲子岁姑洗月云阳韵卿氏宦振声拜稿”等序文3篇,序文后又有“汪桂林丰江”、“朱轩霞城”、“刘僕蓉坡”、“刘之晋锡蕃”、“沙岭颐园”、“吴鏊兕莲”、“杨绍祖芷衫”、“季士羲我山”等8人题咏诗词21首。这些序文和题咏,除宦振声序文无版框、每面6行、每行20字、共4面外,其他皆为双边版框,版心上部书写“第四楼”,下部钤有长朱印一方曰“卧云山房主人”。所有序文、题咏都无撰者钤印。

正文之前,是“红罗记传奇目次”,依次开列该剧出目:

卷第一

第一出 陈情; 第二出 遇侠; 第三出 种情; 第四出 窃稿; 第五出 知信; 第六出 投诗; 第七出 规奴; 第八出 劝试; 第九出 逃香; 第十出 吊影; 第十一出 江逢

卷第二

第十二出 乔寓;第十三出 借道;第十四出 游园;第十五出 帐楼;第十六出 游寺;第十七出 玩雪;第十八出 访云;第十九出 戒痴;第二十出 花朝;第二十一出 月夜;第二十二出 设讽

卷第三

第二十三出 和盟;第二十四出 扫花;第二十五出 诗蚌;第二十六出 奸谋;第二十七出 婚变;第二十八出 会阁;第二十九出 践约;第三十出 罹凶;第三十一出 自首;第三十二出 悲逢;第三十三出 哭别

卷第四

第三十四出 称王;第三十五出 劫犯;第三十六出 媒唆;第三十七出 逃山;第三十八出 震选;第三十九出 锁院;第四十出 邮亭;第四十一出 遇选;第四十二出 庵会;第四十三出 圆镜;第四十四出 励世

全书正文实际出目与“目次”所列不尽相同:正文第四出为“知信”,第五出为“窃稿”,与“目次”相反;正文第六出“盟诗”、第八出“劝友”、第十出“吊云”、第二十二出“讽云”、第二十八出“阁会”、第三十七出“释盗”、第三十八出“婢救”、第四十三出“楼圆”,与“目次”所标也不同;此外,正文中第二十五出误标成“第二十四出”、第三十九出误标成“第三十八出”、第四十出误标成“第三十九出”、第四十一出误标成“第四十出”、第四十二出误标成“第四十一出”、第四十三出误标成“第四十二出”等。

正文皆无版框,正楷书写,每面7行,每行20字(宾白缩格为每行19字)。正文皆经圈点,其中朱笔圈点6处,余皆墨笔圈点;有墨、朱两色笔添改痕迹,其中墨笔添字24处、改正18处,朱笔改正18处;又有墨笔评点8处,其中夹批6处,头评2处。

第一册封底用旧稿纸,墨笔书写:

卧云山房投笔集卷三十一

玳山小雅秦子陵

诗余单调小令

十六字令

正楷字体，与正文相同，但旧稿纸倒装。

第三册封底一页纸为该剧第三十三出“哭别”中因写错而废弃之稿纸，小楷字体，与正文相同。

第四册卷末墨笔署“雨千弟林滋读校”。

书内有南京图书馆所做书签，著录为“秦子陵《红罗记传奇》四卷，四册，道光间手定清稿本”。

二

《红罗记》传奇稿本的8位题咏者中，朱轩、刘之晋、沙岭、季士羲四人同时为《如意珠》题辞，笔者在拙文“秦子陵及其《如意珠》传奇考辨”已有论证，此不赘述。刘儼和杨绍祖的情况，待考；汪桂林与吴镡的情况则有线索可考。

[同治]《如皋县续志》卷九“耆寿传”载：“汪桂林，字凤巢，庠生，少颖，异工诗，名流过海上者，唱酬无虚日，有《半江诗钞》，寿七十六。”《大清如庠题名录》卷三：“嘉庆丙辰元年岁入二十二名：……汪桂林，半江，……童古录取：汪桂林。”《如皋管氏宗谱》卷二十四“列传”收有汪桂林所撰《刘孺人传》，文末案曰：“汪桂林，字半江，附生。”可见，汪桂林，字半江，而非字丰江。“丰江”为“半江”之笔误，是请人誊清时钞错所致。从该本正文的字迹文面情况和“丰江”细节两个方面我们知道，如同《如意珠》稿本一样，《红罗记》稿本也是誊清稿本。南图编目者将秦子陵《红罗记》传奇确定为清稿本是正确的。又考《大清如庠题名录》卷四载，“同治戊辰七年岁入三十二名暂额十名：……吴镡，咒莲”，为该剧题辞的吴镡系清同治戊辰七年的庠生。

笔者曾根据秦子陵《如意珠》传奇稿本面貌，考证出秦子陵名

城，字逸春，号莲乡，又号叶村、吟坛、双龙潭钓客，别署卧云山房。《红罗记》传奇稿本扉页有阴文方朱印“秦城”、阳文方朱印“子陵”、叶形阴文朱印“卧云”以及序文、题咏页版心所钤长朱印“卧云山房主人”等则印证了笔者此前的结论。根据《红罗记》稿本第二、三、四册的署名都有“如皋小雅秦子陵”之说和第一册封底所用旧纸上的内容，可以推知，“小雅”也是秦城的别署。

此外，关于秦城的生活时代，写于“道光甲午岁”即清道光十四年（1834）的管华序文称，“莲乡秦子陵少从余游”；作于“同治甲子岁”即清同治三年（1864）的宦振声序文称，“壬辰岁，遭逆扰，避居如皋之东北乡，借数椽以蔽风雨。适与秦高士莲乡先生结为比邻，幸蒙垂青，不以愚为卑鄙，订忘年交”，壬辰岁即清同治元年；李光玟也为该剧撰序，序文撰写时间为道光乙未岁即清道光十五年^②；由此可见，笔者“秦子陵及其《如意珠》传奇考辨”一文考证秦子陵生年在清嘉庆九年（1804）之后，清同治八年暮春尚在世，在此得到了进一步的佐证，秦子陵为明末清初人之说不攻自破。

《红罗记》稿本还为我们提供了《如意珠》传奇稿本所未提供的秦城生平材料。管华序曰：“莲乡秦子陵少从余游，工诗、古文、词，其举业则风华典赡，气势排奁，诚所谓少年文字气象峥嵘者，破壁而飞正未可量也。”看来，秦城少年时代就才华横溢，不但工诗词古文，而且时文也写得好。此外，宦振声序文和第一册封底所用旧纸上的内容又告诉我们，秦城家住“如皋之东北乡”的玳山，且被宦振声称为“高士”，那么，秦城的生命后期自然就是一位虽未取得功名但其才学品德为乡人所敬仰的乡间名士。对于管华提到的秦城才学，宦振声的序文同样予以肯定：“虽然，先生之令人可钦可羨者，不止此。于举业则超超元箸，气象峥嵘，超超元箸，可以仿佛乎焦储；于诗古则风华典赡，色色精工，可以颉颃于李杜。至于丹青，笔妙触手生春，则又先生之余事耳。嗟夫，人各有所能有不

能,若先生所谓无所不能者,非耶!”秦城非但传奇写得“令人可钦可羨”,而且举业、诗古、丹青样样精工,可谓无所不能,实在是乡间少有的奇才人物。

从《红罗记》稿本第一册封底所用旧纸的书写内容我们知道,秦城另有至少三十一卷的诗文集或诗词集或词集,名曰《投笔集》,该集的第三十一卷收有“诗余单调小令”,其中首列“十六字令”。

关于《红罗记》传奇的创作情况,秦城的恩师管华序文指出,秦城在研读经书之余,感到“笔墨无聊,俯就音律,作传奇五种,曰‘五凤楼’,索稿读,子陵以第四楼嘱评点,穷日夜而卒业觉心为之醉,神为之移焉。”由此我们得知,秦城曾经创作过五种传奇,总名为“五凤楼”,其中《红罗记》传奇为“第四楼”,《红罗记》稿本正文的评点者即为管华。秦城《如意珠》传奇又名《第五楼》,笔者在拙文“秦子陵及其《如意珠》传奇考辨”中曾断言,“该剧之前应还有四部剧作,每部剧作分别冠以‘第一楼’、‘第二楼’等别称”,管华的序文再次证实了笔者的推论。宦振声序曰:“适与秦高士莲乡先生结为比邻,幸蒙垂青,不以愚为卑鄙,订忘年交,盘桓久之,先生将所著《芭蕉楼》传奇示览。”可见,《红罗记》传奇又名《芭蕉楼》,这与《红罗记》稿本扉页所画芭蕉树以及该剧剧情正相吻合。另外,《红罗记》稿本扉页所标书名为《驻春楼》。所以,“第四楼”《红罗记》的别名有《芭蕉楼》《驻春楼》等。

在“五凤楼”中,《红罗记》排在《如意珠》之前。笔者已经考证,《如意珠》作于清同治六年(1867)之前,那么,《红罗记》的创作更早。现在我们发现,在《红罗记》稿本的三篇序文中撰写时间最早的是管华序文,该文写于道光十四年(1834),那么,《红罗记》传奇的创作当在道光十四年之前。由于该序文提到秦城已经创作了传奇五种曰“五凤楼”,所以,这就把《如意珠》传奇的创作时间由清同治六年也进一步提前到清道光十四年之前。需要特别

指出的是,南图书签将《红罗记》稿本的成书年代定为道光年间,而稿本中宦振声的序文写于同治三年,在道光年之后。这是因为,《红罗记》传奇稿本在道光十四年之前就已经写成,宦振声序文是后来补写的,这从该序文所用纸无版框而管华、李光屿两篇序文所用纸有版框的版本特征,也可得到证实。

三

《红罗记》第一出《陈情》副末开场所唱的[中吕慢词][沁园春]概述了该剧的主要内容:“玉史黄生,云娥小姐,赠帕投笺,忽舅家遭变,孤孀母子,江南寄足,千里乔迁,痴意书生,失身下贱,借道东邻访好缘。天心巧,喜前缘未断,错递红鸾。强邻逼娶婵娟,到无可如何夜奔焉。那豪家索迹,定成劫杀,佳人自首,生配冰天,易姓更名,荣归完配,正遇伤心采秀船。那时节,真情毕露,奉旨团圆。”

第一出《陈情》副末开场所吟[满江红]词点明了该剧的主题:“抱恨终天半途里,前功尽弃,问上帝,生才如是,谈何容易。即此英年如此耳,前程不卜可知矣。欲学他人力可回天,浑无计。论福命,轻如纸,淋笔砚,心难死,叹年华弱冠蹉跎过已,未得文章华工国,怎能姓字垂来世,没奈何填几曲词儿教新戏。”《红罗记》传奇的创作旨趣在为有才华而不得志的书生鸣不平,让这样的书生得到其所应得到的金榜题名和洞房花烛,是作者秦城发自内心的愿望。因为秦城本人就是这样的才华横溢而又人生偃蹇的人。作者将含有词作的作品集取名为《投笔记》,同样是哀叹自己“十年面壁”而不得其果的命运。

《红罗记》传奇取得了较高的艺术成就,管华序曰:“于斯悟临川、赤水、山阴、凤洲诸人学力。而作者殆先得子陵励世之深心也夫。然则子陵此作亦必与《玉茗堂四梦》、《昙花记》、《鸣凤记》、《四声猿》诸院本并传不朽矣。”宦振声序曰:“愚盥薇读之,不觉

心旷神怡，踌躇满志，向所叹设想奇而结构不紧者，先生则无不奇、无不紧矣；向所叹词调朗而典故不详者，先生则无不朗、无不详矣；向所叹摩形肖声泛应曲当者，先生则手挥目送，操纵自如矣。噫，观止矣！虽有他作，不敢请矣。”管、宦二人对该剧的评价虽不免有过誉之嫌，然而，情节的曲折、结构的严谨、语言的典雅、描绘的生动等的确是《红罗记》的优点。当然，《红罗记》并不是完美无瑕的，如卖弄学识、曲终奏雅等一般文人剧作常犯的毛病，该剧也未能避免。

注：

① 详参拙作“秦子陵及其《如意珠》传奇创作考辨——兼论新发现的《红罗记》传奇稿本”，载《文学遗产》2004年第5期，第107-114页。

② 李光屿，字云渚，清如皋珙山人，与秦城同里，有《云渚诗钞》，清嘉庆十六年（1811）刻本，据卷首管序，是书刊刻时李光屿约20岁，则李光屿道光乙未岁为《红罗记》作序时约44岁。

作者工作单位：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书讯：中国古代史学家年谱（全八册）

精装大32开，定价1800元，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5年4月出版

本书收录中国古代著名史学家年谱计三十余种，其中有司马迁、司马光、魏徵、刘知几、章学诚等，为历史研究者提供重要的史料。